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22（1）：35–72，2024

自然資源管理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相遇：
臺灣東海岸的虱目魚苗、瓊麻、廟宇與人的關係

鄭肇祺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本文從教師經驗出發探討文化和自然資源管理與大學社會實踐計畫的相遇及後果。加入臺東大學後，筆者成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的協同主持人，參與這個結合戶外運動、數位媒體及深度觀光組成的社會實踐計畫，並導入文化資產議題，與學生共同探索臺東地區的文化資產及休閒遊程之設計。筆者以二十世紀中期虱目魚苗的捕撈地點—杉原灣—作為教學場域。時而勢易，昔日漁民從西部移動到此尋找生計的海灣，部份已被核定為富山護漁區。筆者以文化資產及觀光設計為出發點，討論社會實踐計畫如何影響筆者在教學上對自然和文化資源的選擇、構成、轉化與延伸。藉著整理於2019-2021年之間對USR計畫的執行經驗，以及課程設計、調整及反思，筆者討論以下議題：一、以虱目魚的生活史及富山護漁區為例，產業、人、動物的互動關係形成海岸資源管理的軌跡（trajectory）和可轉化的觀光資源；二、人類學背景的筆者在公路上和產業鏈內的移動與非人類系學生共同利用圖像化的方式紀錄臺灣漁民的日常生活及東海岸產業、廟宇歷史；

投稿日期：2022年2月11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2年12月5日
* 本文為教育部補助臺東大學師範學院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攜手共創部落新旅力：山林部落見學旅遊模式建構」及「臺東Y計畫：共創部落好旅遊」之部份成果，鳴謝山海部落遊憩中心及計畫成員、參與學生之協助。為雙重匿名審查的需要，筆者先將學校、系所、計畫名稱作匿名處理，但因USR精神為分享教學經驗，促進社會、環境等之永續，計畫名稱、學校名稱以真實稱呼出現於出版之文稿。藉此機會，筆者衷心感謝自2019年協助各課程進行、共學共作之在地夥伴，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對文章作出的建議。

三、於臺灣學界愈見重視教學實踐的情況下，人類學背景之教師可適應並發揮田野工作的能力，應用於跨學科的社會實踐計畫。藉此，筆者檢視把人與動物、植物互動關係的圖像化作為文化多樣性、永續觀光及地方歷史教材的工作貢獻程度。

關鍵詞：社會實踐，文化資產，海岸資源管理，觀光，課程設計

一、在東海岸執行USR

「我們這裡從前會捕虱目魚苗，後來魚苗都是人工繁殖，就沒有人再抓了。」居於臺東縣杉原灣（又稱「都蘭灣」；*Fudafudak*；Sugihara Beach）的漁民長輩的一段回顧，影響筆者執行臺灣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下稱 USR）的路徑。在看似偶然，卻具有歷史淵源的情況下，東海岸的產業文化讓筆者以社會實踐計畫執行者的身份，與自然資源管理的主題相遇（encounter），因而與學生探索當地人與自然互動的經驗，將之轉化為計畫主體「深度觀光遊程規劃」的教學資源。

在本文中，筆者以自身臺灣東海岸的教學進而探討參與相關之社會實踐工作。筆者建基於長年針對養殖漁業的研究經驗，在參與USR時，延伸對虱目魚苗捕撈歷史相關的海岸資源管理（coastal resource management）的研究及教學，因此登上下述臺東大學一個名為「臺東Y計畫」（下稱Y計畫）的USR「專車」，遊走於大學與東海岸之間。本文書寫Y計畫把杉原灣納入計畫場域後，跨領域教師協作的契機與挑戰。東海岸各種開發案（包括美麗灣事件）引發杉原灣觀光、土地開發與環境保護的爭議，同時又因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下稱「富山護漁區」）的成立而引致管理者、居民與觀光業者的緊張關係。當大學沿著臺東海岸的公路規劃執行USR時，既考量教學及在地合作的可行性，亦嘗試要對當地的文化多樣性、社會關係及政治形態進行理解，並作出執行決策。主要執行計畫的大學教師，除了在計畫結構與個人行動力互動之下制定教學及行動策略，也產生跨領域的對話。下文將視杉原灣為異質性高的社區，以筆者在2019至2021年的計畫參與、課程安排及教學經驗作為田野資料，探討各領域專家的合作下，人類學價值及方法如何融入USR計畫，並串連學校團隊、社區及個人的社區認知。

本文先進行有關應用人類學、社會實踐及大學教師參與相關工作的文獻回顧。然後，透過了解社會實踐的行動者網絡，筆者將之與海岸資源管理分析框架與產業技術討論結合，帶出有關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研究問題。當不同利害關係者的自然資源管理經驗與USR相遇時，筆者透

過串連各個場域的「點」，選擇民族誌資料作為教材，與跨領域團隊的教師及學生再次認識東海岸的人、社區和產業中的物。筆者將透過「場域的教材化」及「圖像化成果後「『共作』」的不確定性」逐步探究擁有人類學背景之教師如何一邊實作、一邊修正跨領域社會實踐計畫。藉此，筆者反思把人類學的核心價值及田野方法融入當代臺灣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機遇與挑戰。

二、文獻回顧

雖然早期人類學家已視民族誌資料及書寫為協助處理社會問題，而非象牙塔內的知識（Firth 1981: 199），但近年人類學知識如何應用及作為社會參與的工具已成為全球人類學學界的討論焦點，其中包括其田野工作獲得更大的社會認同為具實際影響力的成果。人類學有其西方殖民主義影響下的經驗（Rylko-Bauer et al. 2006: 179-180），Gilmore（2008: 112）認為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具混亂性（messiness），例如人類學家應否參與軍事需求下的人類學知識應用？這類高度政治敏感的話題往往未能帶來共識，在參與和不參與之間俱可能帶來傷害，使人類學家難以獲得任何壓倒性答案。相對地，作為學校教育工作者，人類學家在傳授知識時因呈現文化多樣性，並從地方社會經驗出發，發展教學內容，較容易成為他們尋求社會平等及公義時提出實質建議的時機（Huaman 2020）。但是，Rylko-Bauer等（2006: 183）認為，對倫理兩難情況的反思及討論，正是應用或公共人類學的核心，學者更需要有意識地找尋政治、社會光譜上的各種彈性，而非單單作立場取捨（take side），當中的竅門就是找出關聯性（relevance）及對應策略（strategy），從而對社會作出學術文章並產出延伸的貢獻。例如，在課程設計及內容選擇上，教師既面對杉原灣複雜的發展情勢，又如何避免在社會公義與觀光設施開發的矛盾中影響教學進度，又可引入深度觀光可能性的思考，並創造學習機會？筆者認為，把人類學知識應用於公共議題學習及培育人材的過程，避免大學課程過早進行鉅觀的社會運動邏輯，有助我們從地方政治的認知中了解各種利害關係者對大學課程的期待，以及反思課程實作的效果。其中，教師的教學設計及材料選擇過程尚待更多探討及紀錄。

討論人類學的應用層面除了是學科發展的一個路徑，亦是就業環境的趨勢探討。面對高等教育工作職位不足以應付每年大量的人類學博士畢業生，投身非政府組織、政府機構及商業機構者日增。在臺灣高等教育體制，各類型的社會實踐計畫提供了過渡性的博士後研究員工作機會予初入學術職場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們。同時，這類計畫也成為新進教師快速適應高等教育體制及其轉型過程的一個步階。不過，接近十年的推動後，人類學家陸續反思此類計畫的成效（例：陳怡方 2017；容邵武 2019，2020；鄭肇祺 2020）、對社區的影響，以及對高等教育轉型的啟發。相對而言，較少討論的是人類學對地方政治、自然資源管理及產業的研究發展，如何應用到強調跨領域的社會實踐計畫中，從學生及教師、場域利害關係者的角度出發，進而了解地方產業轉型歷史所形成為課程教材及學習過程。

針對行動、研究者立場及行徑的兩難，Kirsch（2018）在巴布亞新畿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經驗可作參考。當他展開宗教民族誌田野工作後，目睹金銅採礦業對當地社會帶來污染及生計的影響，因而投身於抵抗行動，而過程逐漸成為他研究的焦點（同上引：12）。他指出，明顯的參與讓他失去向其他派別瞭解觀點及行為的機會，而不確定性也使研究者需要非常大的彈性及創新能力；而參與社會事件跟大學的升遷時間表（tenure clock）有異，參與的事未必獲得任教的機構認同，甚至引起別人的批評（同上引：223）。但是，研究者也開展出新的參與機會（同上引：224），並與地方協力者（interlocutors而非報導人informants）建立更強的互動關係。因為事件發展迅速，研究者也需要以更短、更快的方式，回應地方社會的需求，從中產生行動方案及研究資料。由此可見，當研究者嘗試參與行動，提出應對社會變遷的策略時，任何選擇取捨都將牽動其人際網絡以及可介入的議題，甚至個人的大學仕途。當代臺灣高等教育體制對社會實踐持有較為開放的態度時，[1]大學教師如何將社會議題融入教學，同時與研究旨趣及關懷掛勾，並反思行動與社區的關係，以及與當中牽涉的利害關係者所建立之網絡，則為本文另一焦點。

1 當USR計畫與筆者教職的升遷時間表重疊時，即參與社會實踐計畫成為教學及其他表現的部份評分內容，但又不及研究論文產出來得重要時，筆者確實要在時間管理、課程與研究旨趣結合及工作表現上有所調整。

社會實踐型的工作對高等教育體制而言，是一種較新的行動者網絡（actor network）。因為研究者的角色及任務更為多元，他們處理社會議題的動機、方式及結果比過程更不確定。舉例而言，在本文聚焦的USR及Y計畫，筆者的角色及任務並不包括論文產出，而是進行課程創新及社會實踐。但是，隨著教學工作的設計、進行及調整，加上與不同行動者的互動，筆者獲得參與計畫的教師、學生及在地協力者的同意，把過程作為研究資料處理並書寫。因此，如Kirsch（同上引：224）所述，進行民族誌的方法眾多，短暫的研究方式也可以帶出具備深刻視野的結果。Kirsch對自身處境的優勢及限制思考亦可放於大學教師的USR執行經驗中。本文探索筆者透過計畫建立的杉原灣社區網絡及行動策略，集中討論如何嘗試平衡各種針對杉原灣產業變遷的觀點及經驗，並檢視過程中的社會實踐及創新嘗試，例如觀光地圖及小冊子等地方文化資源及產業文化資產的圖像化及文字化。

本文集中處理東海岸杉原灣的自然資源管理（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變遷與大學社會實踐課程設計的關係。海岸資源管理及海洋資源管理（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屬於跨領域的研究及應用領域。過去，人類學者大多以經濟人類學及文化生態學作為分析框架（例如 Acheson 1988；McCay 1998），討論地方社會及組織在取得（extract）及使用（use）自然資源時的行為及產生的宇宙觀等。政治生態學在1980年代後成為漁業、水資源及水產研究的社會科學主流分析框架（Fabinyi 2010），強調國際及地方政治中自然資源衰竭（Chapman 1989）、污染（Befu 1981）等現象所引致的生計（Loc et al. 2010）、食物安全（Mansfield 2011）、環境保育（Fabinyi 2012）及貿易（Fabinyi et al. 2017）問題，不止透視社會結構（譬如國家治理）中的權力關係，也借用governmentality（Segi 2013）、漁民地方知識（Hoeppe 2007）等概念，呈現漁民、沿岸居民的在地力量、行動力及社會網絡，以及海岸觀光及（或）海洋保護區措施的環境影響、社會不平等及居民反應（Fabinyi 2008, 2010; Lim et al. 1995; Stonich 1998）。Bennett（2019）強調具有建設性的跨領域公共參與是人類世（anthropocene）中海洋永續的希望（參見 Berkes 2015）。上述自然資源管理的相關研究，俱為筆者進行教學與社會實踐的基礎，以本文為例，師生需要共同透過在地視角去認識海岸的自然

資源，同時在有限的課程時間中對杉原灣的政治生態有所認知，雖然未能如民族誌研究般進行數量較多的深度訪談，但從在地業務參與者的分享中獲得資料後，師生從不同尺度建立對海岸自然資源的知識，轉化為教學的成果。在學生初步接觸此類型議題時，深度、永續觀光的探問成為涵蓋上述政治生態的切入點，使課程作業及後續成果的設計讓議題再現。這過程不能影響社會事件的走向，但讓非人類學系所的學生透過圖像和文字體現人類學價值。

本文案例除包含USR計畫的課程結構及實作外，也涉及筆者對漁業變遷紀錄的意圖。社會科學學者過去研究臺灣虱目魚產業（曾品滄 2012；Cheng 2019），多集中於西部的成魚養殖及產業發展。近年，除了水產試驗所於臺南七股區進行虱目魚淺坪式養殖，藉以持續已在產業消失的魚塭管理方式外（黃書彥 2016）；台江國家公園（2013年）還以紀錄片「魚音繞梁—戀唸台江」推動虱目魚苗的產業文化資產之紀實，漁民技藝之一「數苗歌」相關的音樂資料業已出版（鄭方靖 2015）。本研究則進入臺灣東部漁業觀光，從漁民移動、捕撈及出售虱目魚苗的經驗出發，了解東海岸與虱目魚產業的關係，並藉著教學設計中漁民口述歷史及手叉網的出現，討論產業歷史、宗教及文化資產作為教育工具及觀光資源的可能。其中，本文涉及文化再現的過程中，而筆者作為大學教師成為當中的行動者，而非中立（neutral）的研究者時，所創造的策略及選用的工具，將是討論範圍。如人類學者在各種公眾人類學案例中使用的視象化（visualize）工具（Soukup 2011），筆者將描述相關視象化的過程、考量及反映的地方政治生態。

三、研究問題

筆者從執行Y計畫的經驗出發，反思及分析2019年9月至2021年7月曾執行之課程設計、調整，並呈現圖像化的成果。藉此，筆者討論以下問題：本文探討的Y計畫以跨領域大學教師共同執行的方式進行，其原因、過程及效果為何？人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海岸旅遊（coastal tourism）的軌跡（trajectory），又如何形成Y計畫的網絡？隨著筆者往返學校和場域，加上多

重身份的隨時切換，其背景訓練如何影響Y計畫的場域建立和經營？筆者如何轉化場域的歷史及空間變化為教學及社會實踐的資源？

四、非人類學系所的人類學教育

人類學研究過去集中於個人與報導人的互動關係而產生的民族誌書寫，在教育中如何應用這種處境下產生的人類學知識和價值則較少受到關注。近年，針對海岸環境及漁業的書寫正在增多（如呂欣怡 2020；吳映青 2019），而如何把產業的歷史、文化放進人類學教育則有待探討。雖然對鄉村社會的民族誌研究早已跳脫出對「封閉」社區的想像（Kearney 1996），而是透過追蹤不同的網絡，理解社區與大社會的關係，但是如何在教學設計上連結田野調查資料、社區需求與學生學習過程，需要更多案例探討。在講求系所之間的合作，進而與社區相互學習的計畫語境中，在非人類學本位的大學系所教導人類學知識及田野技巧，同時顯示人類學與其他學術的跨學科協作可能，皆為高等教育跨越學科界線變革中筆者關注的議題。

本文聚焦深度觀光的專業教育，試圖透過筆者的課程設計及社會實踐計畫的執行，討論以教學為目標的田野資料轉化過程。筆者從中吸收觀光、戶外運動等專業的實作教學方式，也投入人類學者較擅長的文化資產保存及紀錄工作。筆者在18週共54小時為本的課程設計中，思考如何把田野報導人或計畫場域引路人放置於業師、講者、導覽員的位置，找到讓對方向學生分享生命故事的空間。因此，筆者與他們不只是研究者－報導人的關係，而是共同建構課程內容，從而兼顧讓筆者達到計畫目的的同時，也達到把地方轉化為教學、計畫兼營的「場域」，將在地協力者、引路人的日常生活有選擇性地教材化的目標。

筆者自2019年起接觸臺灣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工作，採用一邊實作、一邊修正的模式。除結合學科背景、與其他教師互相學習、產出研究成果及設計課程外，教師亦經歷在計畫場域的網絡拓展和收縮。有時候，教師及大學未必在地方受到歡迎，或受法律、疫情等因素所限，未能轉化地方為教學場

域。本文案例則主要描述網絡的拓展所引致新教學場域的出現，視筆者為網絡中的一位行動者，而其他人與非人成為潛在的網絡成員，甚至串連不同利害關係者的行動者。

本文探討計畫成果與場域引路人（同時作為利害關係者）的關係，思考前者作為民族誌的階段性作品的可能性。雖然本文所提及筆者的課程成果目前只在大學內展出，但從成果的產出形式，利害關係者的反應，以及計畫執行者預期進展，加上其他教師的工作成果，皆可形成有關計畫實際成效的討論。另外，當人類學者投入計畫的時間不如傳統人類學的長期田野研究的期待，如何透過計畫執行期間及關鍵目標的達成，產生民族誌內容，並加以圖像化及教材化，亦是本文探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田野方法論的一個重要部份。

五、杉原灣的政治生態與USR計畫

杉原灣在20世紀至21世紀初的臺灣社會上具有多種角色。在20世紀時，阿美族人作為主要居民，視杉原灣為其領域。有阿美族群體從臺東馬蘭、成功鎮等地遷移到杉原灣，沿岸居住並進行漁獵。從臺灣南部進行季節性遷移的漁民，亦與族人一樣，在農曆三至九月虱目魚苗及烏魚苗聚集時，就會至沿海捕撈魚苗以換取生計。另外，亦有鏢旗魚、香茅種植及煉香茅油、瓊麻收割（製作纖維）等產業。城市發展、都市化等都使青壯年逐漸改為從事板模、航運等，有工頭也到東海岸尋找學徒到苗栗縣三義鄉擔任木雕學徒。如今，城鄉移動已是東海岸社區居民的常態。

21世紀初，臺灣東海岸成為遊樂區、觀光飯店、渡假村開發案的目標（白宜君 2020）。環境保育團體掀起訴訟，並帶領社會運動，對開發案進行抗爭，並挑戰開發規劃的土地正義、程序公義等問題。臺東縣政府、開發公司等，則以經濟發展及就業機會作為原因，企圖遊說反對者轉為支持東海岸的大型觀光化。居於杉原灣及附近的部落，彼此之間也有意見分歧，個別部落內部亦出現糾紛。其中，自2003年起，位於杉原海水浴場上的美麗灣渡假村BOT案因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問題，引發大型抗爭運動，當中除部落居民，

也有研究團隊進行珊瑚礁生態調查，以其覆蓋率減少而作為反對理由（不著撰人 2020）。公民團體亦辦理音樂祭、阿美族生活體驗活動等，爭取公眾支持並逼使渡假村停工（同上引）。2016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臺東縣政府在環境評估上的決議違法，開發案不能復工，外包公司在2017年提出仲裁要求，希望能解除臺東縣政府的BOT合約（呂培苓 2020）。2020年10月的仲裁結果為臺東縣政府以6.29億新臺幣購回所有權。目前，杉原灣附近之大型觀光設施開發案受環境運動所阻檔，美麗灣渡假村是否拆卸或開放使用，仍未有定案（同上引）。

於臺東大學任教的數位教師曾參與反美麗灣的運動，也帶領學生了解運動始末。據筆者理解，參與Y計畫的教師，雖個別支持該運動，但未有抗拒在社區了解不同聲音。另外，一些教師以都蘭部落為場域，自2020年起執行另一個以產業推廣處為執行單位的USR，進行地方創生相關之教學創新及社會實踐。在下述的Y計畫中，杉原灣作為一個計畫場域，則是由深度、永續的戶外活動以及觀光模式作為前提，其中位於富山村的富山護漁區成為首個與計畫合作的場所。其中一場於2020年9月舉行的內部會議就曾有教師之間的討論，對富山村（包括杉原灣的不同聚落）的社會情況整理為：社區缺乏年青人，也未有深度觀光相關之營利模式及技能，因此，相關社會實踐為其中一個教學目標的課程，應以「培力技能、觀念」、「人材培育（例：校內實習生）」、「責任轉移（Gradual Release of Responsibility）永續經營」為目標。[2] Y計畫並未直接針對美麗灣案等作出直接回應，而是在環境、經濟及社會永續等方面的各方拉扯中，於杉原灣尋求在地利害關係者的協作，並嘗試提出有利在地的社會實踐及創新方案。

「做計畫」已是大學教師必須面對及近乎人人參與的事情，但回應各異。部份教師選擇不參與學校團隊型的社會實踐計畫，而是以個人行動實踐社會參與的理想；也有教師一個計畫接另一個計畫，隨計畫投入相關場域的團體及活動。以上「做計畫」與「不做計畫」的決定之間，教師考量的條件包括時間及人力投入、團隊成員的磨合及計畫對場域實際可能造成的好或壞

2　2020年9月Y計畫內部會議文件。

影響，甚至在地協力者對大學團隊的期待或疑慮等。雖然從大學營運角度，「做計畫」代表新的資源注入，也是校內教師合作交流的機會，但教師們實際上需要尋找社會實踐計畫當中的意義，並決定是否加入團隊，方能團隊磨合及與在地社區接觸後，了解自己是否能長期參與在內。

在投入USR計畫後，筆者逐漸摸索出跨學科合作的需要，並利用認識景觀、休閒觀光、數位媒體、行銷及戶外活動等領域的課程設計及作業形式，找到社會科學在「做計畫」中的位置：長期於計畫場域（社區）中遊走並建立與當地人的互信關係，並適當調節帶學生進出場域的節奏及頻率，以配合其他教師的規劃。這樣「做計畫」，使筆者減少了對居民的需求，並盤點各物種作為自然資源，如何和計畫執行目標產生各種可能，並從中追求「做計畫」的意義：紀錄東海岸產業相關的動、植物，並讓其成為大學、公眾可使用的環境、文化教材。

六、跨領域：學系、計畫與課程安排

近年臺灣高等教育政策提倡跨領域教育、學習和研究，相關英文語彙的概念卻有所區別（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21）。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可定義為由兩、三個學科整合出的研究觀點或方法去處理問題，亦可分為以下三種：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強調學科本身的邊界，學者或學術團隊利用各學科的觀念及方法去共同解決問題；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則為學者從不同學科整合（integrate）理論框架，在一個共同概念下，在研究過程中的各階段使用各學科的觀念及方法；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則由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術團隊成員共同製作新的理論、方法，意圖打破學科邊界，並解決問題。臺灣的跨領域學術工作主要強調不同系所、或是同一系所內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在一個研究、教學或社會實踐（有時是三者並存）的計畫內，一起執行及完成該計畫：

> 教育部自107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

> 心任務，由大學師生組成跨領域團隊，主動發掘在地需求，協助解決區域問題。
> 同時鼓勵大學跳出傳統教學研究框架，將學生的學習與學術研究帶入實踐場域，藉由回應在地需求與兼具創新性的課程教學設計，培育出具新思維又接地氣的創新人才。（教育部 2020）

因此，在USR框架下，跨領域是「人與人」的團隊組織，除了大學教師，也包括大學生，探問在地需求之時，亦需要在課程教學上進行創新，並以培育人才為最終目標。由此可見，參與團隊的學者面對兩個計畫裡的利害關係者：在地成員和學生。除了在地成員的異質性，校內參與USR的學生來自不同系所，在目標、能力和表現具備巨大的差異性。計畫的明確目標是人才培育，而「在地」是什麼？則要由團隊去探索。筆者認為，延伸問題是「誰的在地需求？」在這個探索過程中，團隊如何組成，他們又透過誰去找到誰的在地需求？以上皆是筆者自2019年二月起執行USR後，逐漸意識到的問題及思考方向。當Y計畫較為接近multidisciplinary的合作方式，筆者進行人類學教育具備自主性，同時借用同一系所觀光專長教師之作業及實作方向，讓學生達到具備文化敏感度的觀光學習作業要求。

甫進入臺東大學，人類學背景的筆者任教於一個教師學術背景多元的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系（下稱甲系），當中包括管理、行銷、觀光、景觀、心理、歷史、民族學等學科。該系的歷史學教師、Y計畫的計畫主持人曾對筆者說「本系是以文化為體、休閒觀光產業為用」，說明對系上學生的期許，並以此對筆者的課程設計方向作出提醒。擁有管理學背景的A主任，則以「專業經理人」一詞概括本系對學生成長路徑的論述，強調學生在大學生涯時能「登大人」（亦作「轉大人」，閩南語「成年」的意思），在招生時強調臺東縣的在地特色及可作休閒產業應用的文化及自然資源，期望學生能在深度休閒、負責任觀光的永續發展中，成為專家或管理人才。

Y計畫是一個萌芽型的USR。教育部第一期（2018年至2019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由學校申請種子型、萌芽型和深耕型計畫（陳振遠 2017）。在教育部的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2020年至2022年）的框架下（教育

部 2021），臺灣的大專院校可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下稱高教深耕），並可執行種子型計畫，作為大學USR的基礎，進而由校內單位申請大學特色類USR或國際連結類USR，再細分為萌芽型和深耕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的USR由2018年起以萌芽型計畫方式執行，以教育部要求之「在地問題解決構想與發展」作為計畫執行的大方向，成立一個名為「山海部落遊憩教育中心」的院級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來維持計畫運作。中心的成立目標是建立深度觀光模式，在未來轉移予在地居民，由後者持續經營並改善區域經濟。中心執行第一期USR時，把計畫名稱為「攜手共創部落新旅力：山林部落見學旅遊模式建構」，以見學旅遊作為課程設計，讓臺東縣金峰鄉某村的耆老、獵人、文史工作者及陶珠工藝師等，成為課程的業師。此部份主要由校內戶外活動、景觀、行銷及數位媒體專業的教師，設計出套裝體驗遊程（例：攀樹、山林體驗）。筆者在2019年剛加入USR時，一位教師曾分享相關該計畫之教學活動，主要在部落社區以外的地點進行，學生鮮有和居民的互動；他邀請筆者思考如何在這部份設計教學活動。從教學團隊的分工角度看，此一邀請有兩個主要啟示：首先，在臺灣的戶外活動及教育體系中，不難留意到教師在教學中已和地方社區有所接觸，但在如何融合個人興趣、教學經驗與社會關係，則涉及不同層次；如社區是否只是硬體設施提供者，還是學生應在學習過程中與居民產生持續互動，都是教學團隊意識到的問題。其次，人類學背景之教師在臺灣教育體系中被定位為富有地方蹲點經驗的田野調查能手，在團隊與社區溝通之間可以搭建橋樑。雖然以上兩點使人類學家在USR佔有一席之位，但值得留意的是，每種互動都是複雜且步步為營，「做計畫」是否因人類學家的參與而打破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隔閡，並非不證自明，而是有待探索。

加入甲系後，筆者以文化資產、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為主題的課程在大學部任教，後來亦擔任臺灣社會、飲食文化、全球化、觀光地理為主題的課程授課老師。筆者開始任教後即受邀加入USR課程，包括「臺灣文化與社會」及「文化資產與保存」，皆設計成學生學習全球－在地互動、田野調查技巧及地方知識為主。本節則集中描述一個跨領域密集課程的經驗。人類學背景及田野工作經驗讓筆者在2019年暑假、2020年寒假時，參與了一個由甲

系與主要教授數位媒體專業（下稱乙系）及體育（下稱丙系）的系所合作開設，以金峰鄉某村作為場域的七天密集課程。[3]

對學生而言，能否應付課程的多元學習重點，有學生體力不足以完成丙系C老師的要求，而大部份學生對剪輯影片的數位媒體操作屬於初階，他們不眠不休而產出的影片，品質上難跟專業製作比較，因而未能行銷部落遊程，吸引消費者前來體驗。換言之，這種課程暫時仍未能達到USR「解決區域需求」的期望。在「跨」領域USR，邊界依然存在，並反映在學生的表現上。不過，部份學生持續參與Y計畫的跨領域模組，甚至成為中心的實習生，持續增進相關能力。

學生在一個以54小時為主的課程來增進熟識人類學能力，可說是極其困難，而USR的跨領域模式，也讓他們要掌握比一般人類學課程更多元的能力。筆者觀察所見，學生在各領域之間遊走時，難以捕捉到任何一個領域的高階知識。不過，此種課程的優勢在於多元，並脫離原有的課室空間，在社區裡展開更具備學校與社區之間互動條件的學習。於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教學設計呈現優勢：把戶外課程中的任何人和事都視為可觀察、紀錄的資料，由學生打開五感來體驗當中的細節後，將資料轉化為視像內容，表達立場。此類課程並不是培養以學術研究為志業的人類學家為目的，但把人類學價值及視野灌輸至學生生命經驗中，則可為未來企業、政府單位或非政府組織等所需之人材提供相關訓練。筆者獲得這種教學經驗後，亦將之帶進下述有關杉原灣的教學及社會實踐工作上。

3 第一次「山林部落故事行銷」課程共有三位授課老師。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需要跟隨丙系C老師學習在戶外活動的山林野外技巧，如野炊、露營、地圖使用等；乙系D老師在課程初期及後期教授拍攝及剪輯影片的技巧。學生的小組期末作業為製作行銷部落遊程的影片，主題分為山林知識、傳統智慧、林下經濟、農耕作物故事等。代表甲系的筆者負責訓練學生有關田野調查的基本方法。此部份之課程以故事行銷作為主題，筆者教授田野調查的基本技巧及倫理，學生一邊跟隨業師體驗及紀錄排灣族及魯凱族文化，並參與林業試驗所團隊提供的植物研究課程及實驗區植物解說，同時拍攝相關片段。在整理劇本及剪輯片段時，筆者則負責透過小組討論，加強學生的媒體倫理及文化敏感度。筆者曾另文描述學生有關是否把獵人教學狩獵過程的片段放進影片的討論，本文不再贅敘。有關2020年另一次的「山林部落故事行銷」課程經驗，筆者將另文書寫。

七、「來去杉原灣」觀光地圖

本節描述筆者在田野調查課程的設計上，透過接觸動植物來建立體驗活動及實作作業。如上文所指出，教育部的USR計畫邏輯以人為主，重視地方及學校人才培養。但是，如何能讓人成為地方永續經濟、生態、社會的一部份，則未有進一步闡述，而是由各學校透過計畫規劃及執行，以計畫書和報告方式，對永續發展作出說明和建議。當大學教師選定計畫的地理範圍後，找出執行計畫的地點，並在計畫書上整理出一套計畫邏輯作為論述，從而合理化大學進入地方執行計畫的行為。但是，規劃和執行常常出現落差，原因包括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引發的動態修正，也會發生大學團隊「發掘」（或是向地方居民學習）出在地可以使用、轉化的「資源」，但引起的不便。本案例具體說明上述過程，並討論場域的設定，如何延伸出筆者的做法及背後行動邏輯。

本文案例中的USR在2019年下半年進行第二期申請及計畫書審查，由甲系A主任和丙系B老師共同執筆。A主任有森林學、管理學及觀光學的多元學術背景，亦曾在臺東縣內數個社區及創業計畫中擔任導師、顧問的角色，推動深度觀光；對比大眾觀光，他強調小規模、深度觀光活動，透過體驗、導覽解說等方式，讓社區在能承受的觀光影響下，經營永續的經濟活動。B老師長期投入戶外運動，在校內教授潛水、水上運動、登山等知識及技巧，為學生熱愛的課程。在該系投入到USR的課程中，都加入「無痕」（Leave No Trace）的概念，透過事前規劃、在可承受的地點活動、適當維護環境、不取走任何物件、減輕用火造成的衝擊及保育野生動植物等七點上，進行山林戶外活動（悠樂森活 2021）。在Y計畫的設計中，A主任把臺東縣描繪成一個Y字：

> 來臺東旅遊的人，可以住在臺東市，然後白天往三個方向跑：南迴線、海岸線、縱谷線。我們在每條線都有一個點，南迴線就是原來USR的場域金峰鄉某部落，縱谷線則以延平鄉某部落為主，海岸線則是卑南鄉的富山。

A主任說明這種「複合式旅遊……避免利益過度集中於少數的族人手中，而造成部落內部和諧的失衡。」[4]筆者認為，這是一個以公路網絡移動作為觀光體驗的構想（drive tourism；參見 Prideaux and Carson 2011）。臺灣的公路漸趨完善，除促進物流業外，也讓更多人以自駕方式到臺東縣觀光。旅客在臺東市區解決住宿需求，每天到訪一條路線的旅程點，成為Y計畫的主要構想。既然硬體設施已存在，執行計畫的重點放在資源發掘、遊程設計及地方人才培訓。從計畫執行的角度看，Y計畫以「線」為規劃方式，而不在著重「點」，稍為減免了教師們在場域中「塞車」。例如，筆者很少在縱谷線活動，主要是其他老師已在當地執行課程並取得合作成果，筆者則不需要再加重當地負擔，亦讓學生增加對不同社區的新鮮感，減少「幫忙做計畫」的負面印象。

本文聚焦杉原灣的部份，描述筆者從與富山護漁區的合作經驗，延伸至對同一海灘的利害關係者－安天宮及漢人漁民的探索與教學協作。[5]第二期計畫書以富山為場域，雖然行政區域是為卑南鄉富山村，但Y計畫一開始以富山護漁區作為合作對象。富山護漁區於2005年由臺東縣政府公告成立，於翌年成立的杉原海洋生態公園為以禁漁為策略、護漁為目的海洋資源管理政策措施。臺東縣政府於2016年頒布「臺東縣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地區維護管理自治條例」，在翌年根據「臺東縣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地區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成立15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其中包括臺東縣政府委員（六人）、卑南鄉鄉長、富山村村長、莿桐部落原住民推選之代表二人、臺東區漁會總幹事、臺東區漁會富山漁業資源保育管理委員會推選之代表二人。甲系A主任、丙系B老師及計畫助理在計畫開始前後已多次與臺東區漁會及富山護漁區的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下稱F主委）開會討論執行計畫的方式。在計畫執行的第一學期（2020年二至六月），相關課程以三系的教學需求為主，丙系以獨本舟及潛水為課程內容，輔以清理海底垃圾為活動，乙系則以學生參加生態導

4 甲系A主任簡報內容，2020年9月。

5 Y計畫在其他場域的工作及與居於杉原灣的另一族群－莿桐阿美族部落－的互動過程，則在未來另文書寫。

覽活動後製作富山護漁區之遊客互動手機APP為目標。

筆者與甲系A主任、丙系B老師討論後，決定以二年級「文化資產與保存」課程作為參與Y計畫東海岸部份的起步點。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中的部落旅遊地圖及活動辦理旅遊規劃就由這門課程負責完成。筆者設計課程時以文化資產的定義、全球脈絡及文化資產化（heritagization）作為出發點，讓學生認識物質及非物質文化資產相關的議題。課程未有讓學生背誦法規，而是以案例討論為主。因此，筆者亦用上述態度來探索杉原灣裡可作文化資產的教學資源。當時，因著筆者本身進行漁業研究，加上Y計畫的合作對象為富山護漁區，筆者順著此計畫團隊組織分工及網絡，就擔任了「杉原灣文化資源」調查者的角色，透過中心接觸F主委及護漁區的G導覽員，準備進行第一次的校外教學。就在初步理解「有什麼文化資產」的過程中，了解到F主委是「臺東縣傳統知識與實踐文化資產新港鏢旗魚」的保存者之一；另外，事前對富山護漁區一無所知的筆者，從助理口中聽到了自身研究的關鍵字：虱目魚苗。原來，在丙系之前進行一些戶外運動課程時，G導覽員就曾展示一個虱目魚手叉網的模型，並說明杉原灣漁民捕撈虱目魚苗的歷史。因此，筆者請助理安排校外教學時，邀請G導覽員把這部份向課程學生再說明一次，以符合課程教學目的，從中進行參與觀察。

在2020年3月某天下午的校外教學中，學生先抵達護漁區外的一間由主委提供作為會議室的小屋，由G導覽員及其夥伴H導覽員先在庭園針對鏢旗魚和捕撈虱目魚苗進行第一步講解。[6] G導覽員於臺東市居住，為熱愛海洋及環境的居民，參加護漁區的保育工作後，積極協助F主委，也從本是杉原灣居民的F主委口中，收集到當地的各種人物故事，將之轉化為導覽時可分享的文化資源。[7]當天G導覽員講解鏢旗魚外，也請學生嘗試舉起仿製的手叉網（圖1），示範過去漁民於杉原灣岸邊捕撈虱目魚苗及烏魚苗的方式。對筆者而言，這

6 當天早上，筆者與學生先到臺東縣成功鎮參訪，認識鏢旗魚文化。此為2019年課程已有的校外教學活動，該年度的修課學生，部份後來以此為題，進行鏢旗魚成為縣定文化資產後的管理情況的畢業專題研究。

7 F主委把父親從前在成功鎮一帶用來鏢旗魚的漁船、拆出船頭並放置在庭園。他曾在另一場校外教學時站在船頭，拿起鏢槍，向學生講解鏢旗魚的二三事。

是一個研究資料再現的過程。以往因為虱目魚養殖產業的研究，筆者於圖書館、漁業署網站等的漁業雜誌及政府文件中得知，臺灣曾有季節性捕撈虱目魚苗的經濟活動，漁民會前往臺灣南部及東部岸邊，捕撈魚苗，再售予臺南市的魚苗商。政府單位亦發出許可證管理此行為。閱覽相關資料讓筆者初步了解1980年代初人工繁殖盛行前，虱目魚苗的來源及與東海岸的關係。

圖1　學生體驗手叉網（筆者攝，2020年，照片已取得學生同意刊登）

接下來的行程則引發筆者製作「來去杉原灣」地圖的構想。手叉網體驗結束後，筆者和學生一起進入富山護漁區。跟隨著G和H導覽員進入閘門，宣誓不對生態造成破壞及注意安全後，分成兩組亦步亦趨跟上導覽行程。基本上，導覽員雖然以不同路線錯開兩組，但內容介紹相差不遠：濱海植物介紹、寄居蟹生態解說、在沙洞中找尋蟻蛹體驗、摸沙蟹示範及體驗，以及在延伸到海中約二十米的步道上進行海洋動物解說；以上內容並非導覽員的生活記憶，而是從過去的團隊研習，或是從主委口中獲得的知識，加上在導覽解說期間，反覆練習的結果。從筆者觀察學生的反應，加上其他研究者（黃乙芹、邱敬梵 2021）在當年夏天的導覽員與參與者互動觀察所知，遊客對導覽員的摸沙蟹示範最有印象，也最專注。G導覽員在這方面表現比其他導覽員吸引，也使參與者了解到杉原灣居住的漁民及小孩從前的日常生活中，以沙灘中的動物作為休憩活動的對象。

就此遊程的參與觀察以及筆者在臺東生活時與不同居民的交流所知，筆者意識到富山護漁區團隊對杉原灣的論述及實踐，與一般臺東居民對遊客有所不同。臺東居民伴著縣外親友前往杉原灣時，選擇當地的兩間觀海咖啡廳；對居民而言，富山護漁區是一個「從前沒有收費的地方」，而並未開放的美麗灣渡假村前面的沙灘，則是小時候會去戲水的杉原海水浴場，現今縣府因美麗灣事件，加上沒有安排救生員當值，而不能讓人下水。一般前往觀海咖啡廳的人，把車停在臺九線的路邊，或是下述杉原安天宮外的停車空格。他們主要是一邊享用咖啡廳及小食，一邊看海、拍照。當富山護漁區在2020年COVID-19疫情引起的「報復性旅遊」而成為臺灣國內觀光客的熱門目的地之一時，筆者觀察所得觀光客購票進入區內，主要是為了餵魚及拍照留念，護漁區的管理人員則要利用哨子及口頭勸諭以阻止他們隨意觸碰所提起之海參及寄居蟹等生物，對曾訪的觀光客而言，到訪護漁區的主要目的是休閒娛樂大於進行保育（王威凱、江昱仁 2020）。主委曾推海藻饅頭吸引觀光客，他後來發現觀光過量投餵海藻饅頭，使聚集的魚群出現過胖，而海面上也出現混濁的油層，加上環境教育認證機構要求停餵後方能進行認證。主委開始倡議停餵，卻引起了居民不滿其生計受到影響。自2020年9月後縣政府規定居民不能再售賣海藻饅頭後，觀光熱潮隨之退卻。H導覽員曾說，現在不會再看到「魚群胖到肚子向上」，而進行導覽時也較為容易看到水下生物。

筆者與學生認識杉原灣及富山護漁區生態觀光化的過程中，也因應中心於2020年6月規劃舉辦的校內成果發表展覽，思考如何呈現學習成果。在校外教學結束後，筆者除閱讀學生的學習單答案以了解學生對東海岸漁業文化的認識程度，也詢問三位課程中備受同學認可美術能力較高的學生參與製作一張觀光地區的意願，並獲其首肯。在討論過程中，筆者提供的想法是「我們把那裡的XXX咖啡廳拿掉」。換言之，筆者希望能製作出一個以沙灘及漁民生活為題的地圖。當三位學生透過導覽內容，決定放進去的文化資源，筆者則給予文字描述上的建議。例如，美麗灣飯店的建築已經存在，但不開放，如何讓遊客了解「沒有功能」的飯店在杉原灣的象徵意義，而又不會因看到地圖而違法進去「參觀」，學生需要在文字描述上增加「不開放參觀」的字句。另外，學生也補充有關海藻饅頭的描述。這張地圖除勾劃學生的學習成果及筆者的視角，也

展現了富山護漁區的導覽員的不同角度的杉原灣政治生態空間論述。如圖2中可見，除了筆者故意剔出的咖啡廳外，出現的生物都是導覽員曾提及的。換言之，導覽遊程內容成為了特定護漁區保育視角下的杉原灣，而這也影響了兩個部份的圖像呈現。首先，曾帶領學生在杉原灣潛水及進行水下垃圾移除的丙系B老師及中心助理曾建議把礁石放到地圖上，呈現杉原灣水下環境，並提供G導覽員畫出有關他把各礁石群分類的草圖。雖然無法在地圖中具體呈現相關資訊，筆者和學生補上「潮間帶」，以作為杉原灣潮汐景觀的呈現方式。另外，這張地圖的邊緣有放上安天宮（下文詳述），但並未有包含杉原灣的原住民部落。除了因為空間有限，地圖由美麗灣建築物作南方起點進行繪製外，筆者也因當時未與當地莿桐部落接觸，而沒有作為成果展現的一部份。由此觀之，這張地圖是2020年上半年筆者參與USR的計畫成果，也是筆者的人與非人行動者網絡的圖像化結果，反映出臺東丫計畫並非線性（linear）延伸，而是因應計畫引發的社會關係、教師的時間與其計畫管理以及執行情況，呈現出選擇性地把文化資源、社會組織納入，形成一個計畫投射出來的文化圖像。透過具有時效性、壓縮內容的成果展，計畫執行者揭露出在特定時間和空間經歷而成、結合在地經驗及學術思考的知識。

圖2　學生製作「來去杉原灣」觀光地圖（蔡佳恩、王俐雅、蕭燕雯製，2000）

本節集中以2020年「文化資產與保存」課程中，筆者在富山護漁區建立的網絡作為主要討論對象。聚焦深度觀光的專業教育，筆者以社會實踐計畫執行過程及課程設計，增加對杉原灣自然及文化資源的認識。師生在具備生態觀光導賞經驗的護漁區成員帶領下，親自去觸摸海洋生命，也經過踏勘海岸線，與寄居蟹、海參及海星等的海洋生物互動。「來去杉原灣」觀光地圖作為一項計畫成果，把杉原灣的部份歷史及護漁區的部份生物圖像化。「來去杉原灣」地圖的誕生讓文化資源轉化時對時間、空間的選擇圖像化，以上俱是從特定視角（例：筆者、主委、G導覽員、丙系B老師、學生）加上生活知識、保育經驗及導覽內容交錯而成為文化資源內容，並透過觀光地圖，筆者與學生完成了計畫成果的展現。不過，當筆者把地圖贈送予護漁區後，目前仍未見對方在任何場合使用。因此，學生以學習為目的完成的作品，如何應用在深度觀光上，仍是有待進一步以行動研究方式探索。從學生後續參與筆者或系上社會實踐相關課程可見，學生在紀錄、報導人物生活經驗及觀點等有所進步，但規劃遊程如何轉化在地資源而成為保育意義的觀光內容，則視乎個人對環境、生物的認知及投入。

八、杉岸圖

人類學家近年已把「干預」視為參與觀察的一種可能（Marchand 2012），並接受當中可能帶來的互動性功能（同上引：44）。相互傳授的知識都可作為田野資料（同上引：49）。思考自身身份及經驗是否適當地干預的同時，學者也討論多種身份（如研究者加上教師）如何影響與報導人之間的友誼和權力關係，以及當中的協商過程（Kaland 2012）。當研究者同時是教師時，他／她亦需要照顧學生如何獲得能力，尤其是訪談、參與觀察等能力需要各種場景的經驗累積（Barone and Ammons 2021），教學方法及活動設計成為了「干預」的一部份。在跨領域教師及學生參與時，課程教師更能反思人類學方法在不同領域使用的可能性（Rotter et al. 2021）。不同學科對物質（materiality）及身體經驗（embodiment）的理解及知識生產方式迥異

（同上引），因此課程設計及重構有需要考慮知識生產及轉化的方式。社區參與的學習（community-engaged learning）及重視在地理解及學習方法的設計，成為一種轉化的可能（Judge et al. 2021）。下述的行動策略，皆反映筆者針對以上討論的思考。

本節將從另一視角了解杉原灣：從臺灣南部遷來的漁民。我們先從杉原灣的政治生態說明筆者行動策略的形成。雖然第七節的護漁區主委也是具有相同背景的移民後代，但在Y計畫中，他更著重其保育者及地方菁英的角色，其對海岸資源管理的取態亦未盡得杉原灣的利害關係者認同。在分享美麗灣事件的經驗時，主委透露他與支持莿桐部落中支持美麗灣飯店經營的居民的緊張關係，[8]而北邊都蘭阿美族部落，則因長年的打魚活動而對富山護漁區以封閉式管理杉原灣的部份水域而有所質疑。[9]執行Y計畫超過半年後，歷史學背景、有多年執行原住民部落相關社會實踐計畫經驗的計畫主持人，與A主任、B老師及新上任的中心I主任，共同決定要和莿桐部落居民發展友好關係。透過在地小學的引薦，與部落耆老進行參訪及互動。此一舉動，除了擴展計畫執行的地理範圍外，[10]也旨在平衡外界對Y計畫的觀感，以免資源過度傾斜一方。因此，計畫既是選擇性地找出文化資源並進行轉化，也是帶有地方政治敏感度的人際關係經營。USR以大學作為一個擬人化的執行單位，大學和地方要建立關係，才能讓計畫持續甚至延伸。

雖然杉原安天宮並未成為Y計畫針對性部署的對象，但卻與筆者的研究經驗及教學需求相關。筆者在2009至2001年紀錄香港無形文化資產時，經常參與社區性的民間宗教活動，對以廟宇仍為主要社區組織的情況已有研究經驗。在2010年代與臺灣西南部漁村社區研究時，則認識到王爺信仰。因此，當筆者聽過富山護漁區的成員介紹安天宮為漁民信仰的重要宗教場所後，就請中心助理協助聯絡其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作為暑期密集課程「海洋文

8 該部落亦有持反對此見的行動者。見林華嫆（2018）。

9 蔡政良，私人通訊，2020年，日期不詳。

10 筆者在該部落的相關參與經驗，涉及杉原灣小旅行的野菜午餐便當設計、文化健康站食農教育農田地景設計，中心I主任則發展老幼共學DIY活動（例：山棕、茅草掃帚及與傳說風箏石有關之風箏製作活動），筆者未來將另文書寫。

化與休憩活動探索」的準備。筆者在這課程中主要教授田野調查方法，因此希望從漁民歷史中相對於從計畫帶出的權力關係作規劃，與安天宮的接觸是個人經驗、研究興趣與教學需求的重疊。[11]透過廟宇裡的聯絡電話，我們找到總幹事J先生進行會面，了解教學合作上的可能性。

會面的地點是在安天宮的拜亭下，中心助理和筆者與J總幹事在那裡，一邊看著遊客在前面的富山護漁區遊玩，一邊互相認識。J總幹事是退休小學職員，從小在杉原灣長大，十多年前開始協助管理安天宮。[12]這一次的相遇，讓筆者更感受到與虱目魚的「重遇」：小時候有捕魚苗經驗的漁民出現於眼前，分享著捕魚苗的故事。[13]雖然J總幹事已沒有手叉網，但他至今仍會出海釣海鯛，賺取收入。就在筆者決定以J總幹事的口述歷史作為教學內容後，他分享了更多安天宮漁民信徒的經驗出發的杉原灣歷史、地理及文化發展。

以下概述J總幹事有關二十世紀杉原灣變遷的說法。每年農曆三至九月，虱目魚苗於杉原灣成長，從臺灣南部如坊寮、車城、恆春等地的漁民，會沿現今阿塱壹古道走到臺東，再走過石頭路（約為今臺九線之路線）抵達杉原灣，搭建簡陋的矛草屋，利用手叉網在潮澗帶捕撈虱目魚苗。此舉為供應西部之虱目魚養殖產業。隨著1980年代人工繁殖技術的普及，野生虱目魚苗價格明顯下降，失去其經濟價值。不過，原本季節性的漁民遷移帶來兩個影響：一次一位漁民離開時沒有帶走隨身的黑令旗，另一位漁民繼續供奉，後來王爺託夢，漁民再前往臺南縣北門鄉南鯤鯓代天府，得知黑令旗與該廟供奉的吳府三千歲有關，後者的聖誕遂成為杉原灣一個重要民間信仰活動。但把漁民留住的是瓊麻。美國人在二十年紀初把瓊麻引進臺灣，作為製作麻繩、麻布袋等的原材料，目前在恆春仍有一個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為虱目魚苗前來的漁民，看見臺東沿岸瓊麻甚多，收割葉片再售予「小老闆」（來自臺北等地的中盤商），

11 後來，乙系師生曾為安天宮製作介紹動畫，放於中心網站上。

12 J總幹事對富山護漁區的發展亦有其看法，但與此節主題無關，故不作敘述。

13 同樣的經驗亦在莿桐部落發生，筆者亦與一位長輩聊天，他透露小時候有試過用手叉網捕魚苗。葉淑綾（私人通訊，2021年，日期不詳）亦分享臺東大學「黃貴潮手稿及文物數位整理專案計畫」相關資料描述宜灣部落阿美族人在20世紀中期在缺乏市場經濟能力時，當以捕撈及售出虱目魚苗以換取收入的經驗。

部份人後來決定定居杉原灣，隨之出現那界（新蘭）、郡界、杉原及富山四個聚落，而隨著居民落地生根，小孩成長經驗中也有瓊麻的痕跡，他們會把瓊麻葉尖的刺當成筆，在石頭、葉片上寫字，作為娛樂。

以上的內容，除了成為後來課程其中兩小時的校外教學業師演講內容外，也讓筆者進一步理解公路、海岸與產業的自然和文化資源變化。這些資源從前為產業所應用，具備經濟價值，如今則成為人文歷史的痕跡，雖然缺乏產業價值，但卻可能成為深度觀光資源的要角。筆者在金峰鄉的社會實踐工作中，仍聽到居民分享20世紀中村裡的瓊麻種植歷史；駕車往來臺東與南部之間，筆者遇見公路旁山坡上的瓊麻；到訪車城進行養殖漁業的研究，也會興之所至、順道參觀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由此可見，筆者與瓊麻的遇見並非純粹偶然，而是二十世紀臺灣瓊麻產業鏈的形成，以及後來瓊麻散落在臺26、臺11、臺9線等公路地景的結果有關。雖然1980年代後，瓊麻已被塑膠、尼龍等化學材料取代，其產業已衰落，但卻因為漁民宗教活動、公路拓展及Y計畫的執行，而再次以文化資源的方式現身於高等教育課程，也讓筆者有意識地留意到瓊麻在身邊的存在，也在其他田野地點詢問居民與瓊麻的關係，[14]並體認到當地政府單位以瓊麻及其近親龍舌蘭作為公路地景觀賞植物的生物、歷史及產業特質。[15]

隨著兩次的校外教學合作，筆者和J總幹事產生互惠關係。J總幹事先為了筆者的「海洋文化與休憩活動探索」課程，找到30公里的成功鎮一家五金行，購得一個麻線製的麻布袋作為現場教材。在同年九月的另一課程「臺灣文化與社會」的校外教學中，他曾先採集一塊瓊麻葉，用鐵釘把葉片內部的纖維梳理出來，讓學生能夠觸摸到瓊麻的植物纖維。在一次拜訪時，正值農曆十五日，安天宮爐主及J總幹事等人負責燒金紙去犒五營賞中營兵馬，[16]筆者帶同二位學生從旁協助在中營前的工作。在農曆九月十五及十六日，筆者應邀參加吳府三千歲之祝壽活動，除參與宴席、欣賞舞台表演，也與學生四人拿到攝影機記錄其他宮廟、轎班前來參拜的過程，並一起維護廟前空地的清潔。藉此，

14 筆者執行科技部人社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時，了解到達仁鄉大竹高溪流域居民過去亦收集各種植物部份（包括瓊麻），售予漢人盤商，換取生計。

15 不過，沿路對瓊麻的介紹接近不存在，遊客對這段歷史並非有認知。

16 此為王爺信仰儀式之一，在農曆每月初一、十五，廟方安排祭品（例：糧草、金紙），犒賞在社區內巡邏的兵馬。

筆者更為了解安天宮的社區成員在宗教活動上的合作，以及該信仰形成的社會關係。例如：該廟在2021年重建的拜亭，捐贈者包括臺東市內外的信徒；J總幹事認為，吳府三千歲在有需要時，都會找到適合幫忙的人，該人因為祂的靈驗，會主動捐贈，作為廟方修建工作時的重要資金來源。

這種互惠關係及文化學習活動促成了「杉岸圖」小冊子的製作。這個過程為筆者試圖把安天宮納入USR的文化資產化的工具，同時為回饋廟方協力於教程創新的一份禮物。2021年四月，筆者在校內另一個社會實踐課程中，認識到兩名對社會實踐議題感興趣的大學生，並提出合作邀請。我們先到訪安天宮，由筆者分享上述課程內容，以及對安天宮簡介小冊子的構想。然後，透過即時訊息往來，筆者與兩位學生討論出小冊子的基本內容：杉原灣漁業歷史繪圖（圖3）及產業、生活歷史說明（圖4）。與J總幹事會面討論後，我們確定了製作方向以及用途：有信徒前來拜拜時，可藉著小冊子認識安天宮。雖然安天宮並非觀光景點，但以USR的深度觀光遊程規劃來說，它代表杉原灣的宗教景觀，也是漁民移遷歷史的一個見證。因此，製作小冊子是杉原灣漁業文化的文化資產化過程，同時具有口述歷史圖像化及教材化的意圖。圖3可見，我們試圖呈現在同一空間上的歷史事件，從左邊的手叉網捕魚苗，到黑令旗、瓊麻被納入杉原灣的人文歷史，再到硓石土地公及安天宮的出現，以腳印把讀者帶到右邊的歷史事件。而圖4就主要提供文字說明，讓讀者認識J總幹事版本的杉原灣歷史。

圖3　杉岸圖之杉原灣漁業歷史繪圖（繪圖：王繹婷、鍾雨倫，2021製）

圖4　杉岸圖之杉原灣漁業歷史說明（文字內容：筆者整理；王繹婷、鍾雨倫，2021製）

杉岸圖的例子反映筆者建基於一個場域的多個地點，透過教學設計、社會實踐方案，遊走於不同地點，完成計畫要求。杉岸圖的主角安天宮並非USR原定目標，但透過筆者重遇虱目魚所引發的地方知識、歷史探索，加上與安天宮的互惠關係，使杉岸圖成為Y計畫的一部份，並在2021年6月的網上計畫成果展覽中呈現內容。至於杉岸圖對安天宮及杉原灣觀光活動的影響為何，則有待觀察和討論。杉岸圖的製作過程也使筆者更留意人與海岸的互動關係。例如，J總幹事在檢視初稿時，曾分享吳府三千歲選址在舊土地公廟的土地上建廟，有其原因。首先，廟前的礁石排列成一直線，讓王爺能看到南面的富岡地區；另外，安天宮初時臨近海岸，但東部的多次颱風都未能損其分毫，足見其神威顯赫。對B老師而言，海岸線是按水流緩急程度而設低碳水上運動的區域，在富山護漁區的南邊因水流較急，則適合獨木舟的訓練及活動。再往南到達莿桐部落成員日常活動的海岸，水流較緩，適合立槳衝浪（SUP）。對計畫主持人而言，這是一種地域、人群及活動規劃上的分工（北面富山護漁區、南面莿桐部落），避免兩者之者的利益衝突。因此，筆者投入的USR是一種具備政治生態觀點，而又處於計畫執行與互惠關係之間的一種執行方式。

筆者反思執行USR計畫時的倫理與人類學研究倫理的關係。作為從大學來的研究者，一般田野研究多以田野季節（field season）進行，當地報導人能理解研究者會來來去去。當社會實踐計畫強調來自大學的教師對社區有著長期關懷，並作出貢獻，同時又滿足教學需要時，研究者再也不能單純視對方為「研究對象」，而是在地協力者的角色，並要設計出應對研究、教學、實踐條件的課程及作業，及計畫執行節奏，使當地利害關係者、學生、計畫合作教師等，都體認到研究者的誠意、熱情及策略。乙系系主任曾向筆者分享，他在執行計畫時，感受到培育學生長期與社區共事，到下一刻成為他們執行課程時的社區引路人的喜悅。換句話說，USR計畫的倫理與人類學強調的互惠關係（reciprocity）相似，「長期田野」變得更恆常，人與人的接觸更為頻繁，帶著學校的名義進入田野，更需要訓練具備文化敏銳度而又能實作的學生，而非像過去的人類學徒訓練這般強調理論反思，而是「實作即為倫理」。

上述USR的部份經驗結合了筆者對這類社會實踐計畫的逐步理解及對學生參與度的調整。以教師身份走進杉原灣，得先理解美麗灣事件以外的其他人文及自然變化。因應USR的目的及需求，筆者慢慢加入水上、水下活動（例：無動力運動、潛水）教育及觀光體驗的知識，也引入社區、生態觀光經營者的教育重點。而人類學知識、技藝對計畫的補充，則在於學生觀察、體會、轉化「資源」的能力和態度。不過，短期課程只能撒下種子，難以在課程內就看到結果。筆者產生計畫成果的做法，則以個別較能投入到社區工作的學生為主要培訓對象，藉著自然及文化資源圖像化、教材化的過程，尋求和在地協作者的互惠關係之餘，也培養未來有機會長期進行社會實踐工作的人材。就後續的課程安排而言，筆者掌握到一個為期三至四年，涉及三個以上課程的節奏，即從培育對多元文化的尊敬態度起，再注入在地知識，培養學生田野調查能力，最後利用圖像化的觀光行銷作業，使學生有機會和社區接觸，建立進一步的互惠關係。雖然訓練時間及回饋地方的成果仍有待加強，但這種節奏比較貼近人類學長期田野工作精神及技藝，同時產生和其他領域的教學內容之互動。

九、總結：海岸遇見社會實踐

本文透過筆者參與Y計畫的經驗，討論以踏出象牙塔為目標的社會實踐計畫，如何影響教學上自然和文化資源的選擇、構成、轉化與延伸。計畫既是政府以補助方式實現與學術機構之間的權力關係具體化，也是學術機構與地方社會建立「共同」關係的催化劑。但是，是否能建立互信、共好價值的社會關係，則視乎地方社會是否表達出對學術機構社會責任實踐團隊的信任，而同時政府補充單位能否評核學術單位的社會影響力。因此，接受人類學訓練的大學教師在計畫中遊走在結構與行動之間，一邊體會變革中的教育制度，一邊往返學校與場域之間，呈現其研究、教學及社會實踐的行動力。受日常教學時間、行政作業、個人研究及其他計畫所限，大學教師的田野工作零碎化，並以校外教學、演講安排、計畫會議、實地參訪等方式，組裝出田野的圖像，以及場域中不同人的角色，從而一邊符合計畫需求，一邊擔當跨領域合作的設計者。換句話說，在臺灣社會實踐的共作中，計畫對田野調查的想像，由人類學背景的教師實現，是學術機構合理化USR等計畫與社區建立親近度、或是「接地氣」的策略，也是其對相關能力和經驗的實際渴望。

杉原灣的案例說明地方各利害關係者、產業與社會實踐計畫互相交錯的網絡雖然反映臺灣在同類計畫上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面向，但也存有其獨特性（singularity）。USR或其他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雖是有相同的理念，即讓大學展現對社會的關懷並付之於行動，從而產生正面影響。但是，各校從設計到執行USR都無法複製別校經驗。每個USR都有其獨特性，因為其場域都不一樣，是否對大學行動有需求，甚至需求程度都有差異。因此，過於強調國家（nation）或大學尺度的USR，只會導致計畫無法貼近地方尺度的需求，反而產生無效的介入，甚至過度的干預，引起地方社會對大學的反感，因而出現各種形式的日常抵抗。換句話說，社會責任實踐方案是複數（multiple），並因應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有所變異。

USR自身是一個網絡，從大學教師發動，但需要經過地方社會的引路人協助，方能建立計畫的場域。計畫網絡的延伸並非如臺東的Y型公路般單純地擴散（Ferguson 1990），而是透過歷史、空間及當代計畫需求的整理所建

立、鑲嵌在地方政治的網絡。筆者在當中的參與，則是提供一套可以應用在其他教師教學方面的方法和態度作為參考。在各種內部會議中，尊重地方、先進行基本田野調查再提案、並對當地作出回饋，這在筆者出現前，已是主要的概念。筆者的田野調查教學，著重的是建立學生對社區的身體經驗，帶出長期互動的可能價值，並強調「關係－成果－進一步關係」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教師成為網絡擴散的一員，而不是終結者。

社會實踐是地方政治的一部份。本文說明的USR是透過多元學術背景的教師們於杉原灣不同地點進行的設計課程時，需兼顧在地利害關係者的互動歷史及當前緊張關係，以免誤闖了社會禁忌。美麗灣渡假村的使用討論，就沒有納入USR的範圍外。大學除了避免引發衝突，也嘗試跳脫東海岸觀光等同渡假村開發的刻板印象，並引進永續、低碳、深度觀光的概念。不過，計畫執行後除了課程教學的創新及學生與社區的接觸外，當地居民及利害關係者是否感受到計畫的價值，值得持續觀察及討論。例如，當水上活動需要具有證照的教練及救生員，而當地居民人口老化及年青人外移使得能參與訓練及工作的人力不足時，USR的社會實踐方案如何實現？杉岸圖的誕生，除了記載J總幹事的社區口述歷史外，又會產生什麼社會效應？以上仍需要更長時間的研究。

綜合以上討論，「生活教材化」的策略和過程，可作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貢獻。雖然坊間已有風土小旅行、風土經濟學等的提倡，以檢視地方創生能力及其挑戰，或推動強調地方性（locality）的經濟模式。但是，大學作為教育機構具備培養人材的功能和責任，而教育部等政府單位對位於非都會區的大學有所期待，希望後者針對在所身處的縣市作出貢獻。雖然都會區的學校往往會往外縣市延伸其力量，但對處於非都會的大學而言，大學社會實踐類型的計畫是一個產生重疊行政及道德邊界的過程。本文亦說明日常生活的教材化，這包括過去的日常（產業）和當代的日常（宗教活動），並將之轉化為可見、可聽、可觸碰，甚至可體驗的素材。雖然居民和學生的感官經驗有所歧異，但透過物的接觸，學生得以對地方和移動留下印象。因此，本文討論的USR計畫把居民的生活精神與實踐具像化（reify）。相對於傳統民族誌，圖像化和教材化的資料有助非社會科學背景的學生掌握在地知識

及歷史，雖然深度、細緻度不及民族誌，但應是當代教育強調知識應用於產業時的適當工具，也加強學生對人類學的興趣。

筆者在執行跨領域的計畫內容時，留意人類學者加入USR團隊時，多被委派與社區成員接觸、建立關係的任務，而因自身的研究經驗，也傾向盡力與對方成為朋友、夥伴，以較為平等的權力關係去執行計畫。因此，計畫團隊往往會對人類者的田野工作經驗及能力有所期待和依重。但是，這並非人類學者壟斷的能力和行為。本案例說明跨領域的合作需要把「田野」的定義擴充，與生物學、環境科學等的「田野」接連，同時把教育工作的「場地」、「場域」，或觀光休閒領域的「遊程路線」等空間概念一併考慮。因此，除了和社區居民接觸外，如何對自然環境（如本案例的礁石）、水流、海灘等有所觀察、認知及參與，亦可是田野工作的部份。因此，在計畫論述、實踐上強調社區工作以人類學者為核心，未免視野過於狹窄，非但未能打破學科領域之間的界線，反而加強（reinforce）既有的界線，引起學科之間的爭議。本案例已說明在計畫構想及執行上，人類學價值可以在跨域系所、專家合作時體現出來。至於這種合作方式對社區永續發展及學生的學習程度的影響為何，則有待深入探討。未來研究可探討跨領域學程是否及如何影響大學社會實踐計畫，以及其對學生對社會責任的認知與實踐的影響。

參考書目

不著撰人

2020 公民參與的文化路徑 [Cultural Path of Civic Participation]。好康吧。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85490, 2020年11月18日 [November 18, 2020]。

王威凱、江昱仁

2020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海岸遊憩區遊客體驗與價值意涵：以臺東縣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為例 [Applying the Means-End-Chain Theory to the Study of Tourists' Experiences and Values of FuSan Fisher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rea]。社區永續觀光研究 [Sustainable Community-based Tourism Studies] 4(2): 13-32。

台江國家公園

2013 魚音繞梁—戀唸台江 [Fry-Counting Tunes around Taijang]。臺南：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Tainan: Taijuang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Office]。

白宜君

2020 開發案糾結二十年未解，居民業主雙輸 [The Development Conflict Has Not Been Solved after 20 Years. Both Residents and Landowners Lose]。今周刊 [Business Tod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007080023/%E9%96%8B%E7%99%BC%E6%A1%88%E7%B3%BE%E7%B5%90%E4%BA%8C%E5%8D%81%E5%B9%B4%E6%9C%AA%E8%A7%A3%20%20%E5%B1%85%E6%B0%91%E6%A5%AD%E4%B8%BB%E9%9B%99%E8%BC%B8, 2020年7月8日 [July 8, 2020]。

呂欣怡

2020 會議作為未來時間性的匯集與競逐：臺灣離岸風電環評的民族誌分析 [The Meeting As Convergence and Competition of Future Temporalities: An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aiwan's Offshore Wind Development]。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8(2): 79-128。

呂培苓

2020 杉原灣的美麗未來｜美麗灣觀光度假村的下一步，拆還是不拆 [The Beautiful Future of Shanyan Bay: The Controversy of Demolishing the Taitung's Miramar Resort or Not Is Not Yet Over]。公共電視（我們的島）[Our Isalnd,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7211, 2020年11月30日 [November 30, 2020]。

吳映青

2019 海路: 從人類學視角看臺灣近海漁業 ['Hái-lōo': The Interface between Fishermen and Marine Nature]。中國飲食文化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5(2): 7-53。

林華婿

2018 共謀生機：我在原住民聚落的社會實踐 [To Explore Survival Opportunities Together: My Social Practice in an Indigenous Community]。刊於[In]一起：臺灣原住民部落服務的內涵與省思 [Together: Experience of and Reflections on Serving Indigenous Communities], 余舜德編 [Yu Shunn-der, ed.], 頁181-210 [pp. 181-21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Nang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容邵武

2019 平行的田野，交錯的技藝：我在香港與埔里發現農田的故事 [Parallel Fieldsites, Intersected Craftsmanship: My Story of Discovering Farms in Hong Kong and Puli]。刊於[In]ㄠ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 [Back to the Field: Tales from Anthropological Heterotopia]，趙恩潔、蔡晏霖編 [Zhao En-jie and Tsai Yen-ling, eds.]，頁89-116 [pp. 89-116]。臺北：左岸文化 [Taipei: Zuoan]。

2020 計畫作為許諾：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中的會議、國家話語、與社區行動 [Planning as Promise: Meetings, the Language of the State, and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8(2): 27-78。

陳怡方

2017 高等教育轉型的人類學反思：以社會實踐課程的經驗為例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 Study on the Courses of Social Practice]。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2): 147-184。

陳振遠

2017 107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一般大學計畫申請說明會 [Briefing Session: Applying fo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 in 2018]。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ord.nccu.edu.tw/files/news/2635_9c939721. pdf, 2017年8月31日 [August 31, 2017]。

教育部

2020 109年大學社會實踐線上博覽會：USR精神簡介 [Year 2020 Online Expo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of USR Vision]。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2020usrexpo.org/USR.php, 2021年7月16日 [July 16, 2021]。

2021 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徵件須知 [Instruction for Applying fo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203.64.253.149/postfolder/F10810216.pdf , 2021年7月16日 [July 16, 2021]。

悠樂森活

2021 山林知識：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七大原則 [Seven Principles of Leave No Trace in Forest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ulohas.tw/blog/posts/leave-no-trace-7principals, 2021年3月18日 [March 18, 2021]。

曾品滄

2012 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 [Brackish Water Ponds and Freshwater Pod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in

Qing Taiwan]。臺灣史研究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19 (4):1-47。

黃乙芹、邱敬梵

2021 以觀察法評估解說服務對遊客行為之影響：以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為例 [Observation of the Impacts of Docent Service on Tourists' Behaviour: Fushan Fisheries Conservation Area as an Example]。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畢業專題論文 [Honour Thesi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黃書彥

2016 七股地區淺坪虱目魚塭及文蛤池底棲動物相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Benthic Fauna of Shallow-Water Milkfish Ponds and Hard Clam Ponds in Qigu]。臺灣生物多樣性研究 [Taiwan Journal of Biodiversity] 18(4): 281-294。

鄭方靖

2015 台江國家公園地區數魚歌音聲與音樂內涵調查研究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ound and Music Connotation of Fry-Counting Songs in the Taijiang Area in the Southwest Coast of Taiwan]。國家公園學報 [Journal of National Park] 25(2): 1-18。

鄭肇祺

2020 初探非人行動者如何形塑臺東鄉村社區觀光 [How Non-Human Actuants Shape Community Tourism in Rural Taitung County: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社區永續觀光研究 [Sustainable Community-Based Tourism Studies] 4(1): 1-12。

Acheson, James

1988 The Lobster Gangs of Maine.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Barone, Lynne and Samantha Ammons

2021 "Ultimate Introvert" to the "Touchy-Chummy": Using Simulation to Teach Interviewing Skills. Teaching Anthropology 10(3): 21-28.

Befu, Harumi

1981 Political Ecology of Fishing in Japan: Techno-Environmental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Inland Sea.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3: 323-347.

Bennett, Nathan

2019 In Political Seas: Engaging with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Ocean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47(1): 1-21.

Berkes, Fikret

2015 Coasts for Peopl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oastal and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Margaret

1989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Fisheries Depletion in Amazoni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16(4): 331-337.

Cheng, Eric Siu-kei

2019 Managing a Hub: Regional Networks, Trade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Culture of Taiwanese Milkfish Sector.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5(2): 55-113.

Fabinyi, Michael

2008 Dive Tourism, Fishing and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Calamianes Islands, Philippines. Marine Policy 32(6): 898-904.

2010 The Intensification of Fishing and the Rise of Tourism: Competing Coastal Livelihoods in the Calamianese Islands, Philippines. Human Ecology 38(3): 415-427.

2012 Fishing for Fairness: Poverty, Morality and Marine Resource Regul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Sydne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Fabinyi, Michael, Kate Barclay and Hampus Eriksson

2017 Chinese Trader Perceptions on Sourcing and Consumption of Endangered Seafood.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4(181): 162-173.

Ferguson, James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s: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th, Raymond

1981 Engagement and Detachment: Reflections on Applying Social Anthropology to Social Affairs. Human Organization 40(3): 193-201.

Gilmore, Perry

2008 Engagement on the Backroads: Insights for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39(2): 109-116.

Hoeppe, Gotz

2007 Conversations on the Beach: Fishermen's Knowledge, Metaphor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India.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Huaman, Elizabeth

2020 Small Indigenous Schools: Indigenous Resurg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America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51(3): 262-281.

Judge, Andrew, Sherry Fukuzawa, and Jonathan Ferrier.

2021 Local Indigenous Ways of Know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through Community-Engaged Learning. Teaching Anthropology 10(4): 47-57.

Kaland, Ole

2012 Researcher or Teacher? Reflections on Negotiated Roles in the Field. Teaching Anthropology 2(2): 72-75.

Kearney, Michael
1996 Reconceptualizing the Peasantry: Anthrop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Kirsch, Stuart
2018 Engaged Anthropology: Politics beyond the Tex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m, Christina, Yoshiaki Matsuda, and Yukio Shigemi
1995 Co-Management in Marine Fisheries: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Coastal Management 23(3): 195-221.

Loc, Vo Thi Thanh, Simon Bush, and Nguyen Tri Khiem
2010 High and Low Value Fish Chains in the Mekong Delta: Challenges for Livelihood and Governanc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12(6): 889-908.

Mansfield, Becky
2011 Is Fish Health Food or Poison? Farmed Fish and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of Un/Healthy Nature. Antipode 43(2): 413-434.

Marchand, Iris
2012 Teaching in the Field a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thropology and the Ethics of Education in Nickerie, Western Suriname. Teaching Anthropology 2(2): 37-52.

McCay, Bonnie
1998 Oyster Wars and the Public Trust: Property, Law, and Ecology of New Jersey Histor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Prideaux, Bruce and Dean Carson, eds.
2011 Drive Tourism: Trends and Emerging Marke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otter, Rebeca, Laura Jeffrey, and Luke Heslop
2021 Navigating Interdisciplinarity: Negotiating Discipline, Embodiment, and Materiality on a Field Methods Training Course. Teaching Anthropology 10(3): 1-13.

Rylko-Bauer, Barbara, Merrill Singer, and John van Willigen
2006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1): 178-190.

Segi, Shio
2013 The Making of 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y in Manag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from Southeast Cebu. Human Organization 72(4):

336-346.

Soukup, Martin

2011 A Visual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Culture in Yawan, Papua New Guinea: Drawings in the Context of a Visu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a Integra 2(2): 41-51.

Stonich, Susan

1998 Political Ecology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5(1): 25-54.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21 Why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Matter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globalartsandhumanities.osu.edu/about/cross-disciplinary-research. Accessed July 15.

鄭肇祺

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95092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chengsk@nttu.edu.tw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Encountering A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lkfish Fry, Sisal, Temples, and Human Beings along Taiwan's East Coast

Eric Siu-kei Che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encountered university-engaged social practices, and the subsequent consequences, based on a university teacher's experiences. I joined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s a faculty member in 2019. Since then, I have become a project sub-investigator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 (USR),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design courses and collaborate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fishers, environmentalists, and temple leaders, to facilitate regional responsible tourism. The project tasks comprise outdoors activities, digital marketing, and in-depth tourism. I collaborate with students to explor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to enrich designs and itinerarie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our experiences in this project and analyzes how and why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skills, and reflections can be applied to sustainable tourism education and associated regional resource management.

Faculty member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disciplines, including outdoor activities, media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arry out the abovementioned USR project to facilitate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as well as teach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The project has extended its influence from one community to other regions, including Sugihara Beach, a former milkfish fingerling catching area and now a coastal marine resource protection area, where

I design teaching and learnings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record and tourism design to discuss how the USR and anthropological training affect my selection, reconstruction, conversion and extens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teaching. This paper presents my project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between 2019 and 2021 to reflect on my course design and modifica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issues. First, how the changing industrial sectors, the milkfish's life cycl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cluding land development, folk relig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Such interactions affect the trajectory of coastal resource management along the Sugihara Beach. Second, my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 have influenced my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students who are not anthropology majors to record Taiwanese fishers' daily life experiences, life stories, and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local sectors and a temple on the east coast. My courses associated with the USR project have become teaching material collection processes and subsequently changed the ways that I convert life histories into cultural resources aimed at in-depth tourism. Last but not least, anthropologists can apply their ethnographic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practices.

Reviewing both the team and individual work in this project, I shar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SR strategy and evaluate my own experiences and contribution of visualizing human-animal-plant interactions for teaching cultural diversity,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local history. Teachers trained in anthropology co-learn with students from local residents with through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and the outcomes can be more diverse than a textual ethnographic account. The visualiz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can attract more non-anthropology-maj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adopt anthropological skills and thinking. Teachers need to consider how to prevent local politics from disrupting teaching process. They can introduce concepts, practices, and local perspectives to develop more localized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materials can become tools that students can use to develop their non-academic career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can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in their future careers.

Keywords: Industrial sector, technology, social practice, cultural heritage, coastal resource management, tourism, course design